

#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

——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sup>\*</sup>

张伟玉 陈 哲 表娜俐◎

**【内容提要】** 相对于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弱势地位,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更突出,相关研究和著述颇丰。不过,笔者以10种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期刊中含有“非传统安全”一词的文章为样本进行统计,发现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存在以下特点和问题:一是中国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共识大多依赖于学者间的“默契”,对非传统安全的诸多定义可操作性较差;二是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不足,学术成果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三是科学研究方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应用不多,目前非传统安全研究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未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研究范式,距学科成熟仍有一定距离。通过对比中外非传统安全研究发现:在学科自身特点上,该学科整体偏向刺激-反应型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和应用色彩。在研究进程和路径上,中国属于早期扩展派,属典型的“亚洲路径”,美国在战略研究派和早期扩展派之间,主要走“美国路径”,欧洲居于哥本哈根学派和人的安全研究学派之间,走经典的“欧洲路径”。

**【关键词】** 中国 非传统安全 研究范式 亚洲路径

<sup>\*</sup> 本项研究受到王雪莲教育基金支持,本文的完成与李彬教授的指导密不可分,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阎学通教授、周方银研究员、司乐如研究员对本文的指导和帮助,以及《国际政治科学》聘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2期(总第34期),第94—120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学界逐渐展开对“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非军事安全”(Non-military security)、“非常规威胁”(Non-conventional security)等问题的讨论。到目前为止,这些相关概念仍处于形成与发展阶段,学术界在其内涵与外延上尚未取得共识,非传统安全与非军事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和重叠。作为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和安全研究“范式转移”的关键变量,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和影响日渐突出。

1983 年美国学者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H. Ullman)首次正式强调非军事威胁的重要性。<sup>①</sup>此后,尤其是“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研究成为美国安全研究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与乌尔曼同一时期,欧洲学界也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1983 年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其《人、国家与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书中涉及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初步认识:安全的底线是生存,也包括对生存条件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的关注。<sup>②</sup>以后布赞继续通过《人、国家与恐惧》系列的研究,把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从理论上推向深入,他把安全问题分为“经济、环境、社会、军事、政治”五个方面,并把安全对象的层次分为“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单元(unit)、子单元(subunits)、个人”。<sup>③</sup>随着 1994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以及七大安全问题,在国际社会中对非传统安全的相关讨论持续升温。在欧洲学界持续关注人的安全研究的同时,中国等国家也积极开展非传统安全的相关研究。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至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突变,传统安全

<sup>①</sup>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1983, pp. 129 - 153.

<sup>②</sup>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pp. 3 - 9.

<sup>③</sup> 参见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威胁骤然下降，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在此种变局中孕育和萌芽。冷战后到 2001 年“9·11”事件期间，中国开始反思安全概念，提出了包括军事、环境、资源、经济等为内容的综合安全，形成了摒弃冷战思维、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新安全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非传统安全概念和思想的形成。亚洲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开始探讨非传统安全，包括梳理概念、理论介绍等，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开始上升到外交实践领域。2001 年让世界震惊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3 年中国非典型肺炎（SARS）的疫情，2005 年大规模禽流感的爆发，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兴趣陡增，政府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位也上升到国防任务的高度。2006 年之后，部分中国学者从研究非传统安全是什么转到如何应对上来，其中军事部门和研究机构开始关注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当前，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至今，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有何特点、需要解决何种重大问题，中外非传统安全研究有何异同，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将梳理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源流，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代表人物、著作及主要流派，以此窥探当前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容貌”；第二部分将着重分析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达成的共识及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现状、特点和问题，将涉及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枢”和“神经”；第三部分尝试对比分析中外非传统安全研究，了解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路径和进程，并探索性地总结非传统安全研究自身的一些规律；第四部分是结论。

## 一、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

从 1997 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开始，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关的问题开始进入外交实践领域。2000 年第

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唐家璇在讲话中提及“非传统安全”，<sup>①</sup>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以及随后在报刊中首次出现该词。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出现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论述，非传统安全议题开始纳入党的文件和政府报告中。《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进一步将非传统安全列为中国的国防任务。与此同时，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热情也变得高涨。仅1994年1月至2009年2月在CNKI中出现非传统安全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就有1954篇。<sup>②</sup>中国政府和学界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关注，一方面非传统安全的议题和领域宽泛，相对于传统安全，其合作的空间和弹性较大，政府可以利用非传统安全柔化传统安全的“僵硬”对立，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并提升国家在安全事务上的领导力，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就是此种实践的典范。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确实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政府和学界都无法忽视。

### （一）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源流

联合国新安全观是对非传统安全内容和议题的拓展。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重视环境、粮食、人口、贫困等问题，70年代强调安全的相互依赖。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全面阐述了安全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依赖，提出了可持续安全概念。199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的安全的概念，并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作了系统阐述，报告同时阐明了七大安全问题：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

---

<sup>①</sup> 2000年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在曼谷召开，唐家璇在会上说：“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对亚太安全带来负面影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族和宗教冲突此起彼伏，一些国家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受到一定冲击。”参见《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7月28日电。也有学者认为是唐家璇在2001年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的。见《唐家璇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6日电。转引自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非传统安全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②</sup> 赵远良、主父笑飞《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sup>①</sup>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Boutros Ghali) 的《和平纲领》强调人口、毒品、疾病、饥饿等对人类的威胁不亚于传统的战争威胁。《人类发展报告》和《和平纲领》标志着联合国新安全观的形成。<sup>②</sup> 联合国对安全的概念从领土防御、国家利益和核威慑拓展至“普遍性关注”和冲突预防等领域,安全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根除贫困和不发达的全球性努力。<sup>③</sup>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包含了很多与传统安全观不尽相同的内容与思路,在内容和议题上以及对人的关注上,对中国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中国新安全观是对非传统安全手段和性质的扩展。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人类连为一体,安全超出国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自身从国家生存安全转到更多关注国家经济与发展上,传统安全威胁下降,新(型)安全观念逐渐演化。

1997 年 3 月,中国与菲律宾共同举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首次提出适合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1997 年 4 月,中俄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联合声明》,双方主张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摒弃冷战思维,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sup>④</sup>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1999 年 3 月,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对比了新型安全观和旧安全观孰优孰劣。<sup>⑤</sup> 2000 年 9 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指出应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2001 年 6 月

① 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45—47 页。

② 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8 期,第 49—54 页。

③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2.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7 年第 15 期。

⑤ 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人民日报》1999 年 3 月 27 日。

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发表《深化团结协作 共创美好世纪》的讲话，重申了新安全观的内涵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sup>①</sup> 余建华认为新型安全观从主体、内容、手段、性质入手，包括了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人类安全观。<sup>②</sup> 非传统安全观是新安全观的一个综合性视角，以“互信、平等、互利、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非传统安全在性质和手段方面的拓展，促进了中国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形成。

综上所述，联合国新安全观涉及的诸多议题和内容，丰富了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新安全观的互信、平等、互利、协作的观念，促进了中国非传统安全概念在性质和手段方面的拓展。二者对非传统安全理念的形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影响了其演变及发展。可以说，中国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和内容源起于联合国新安全观和中国新安全观，其源流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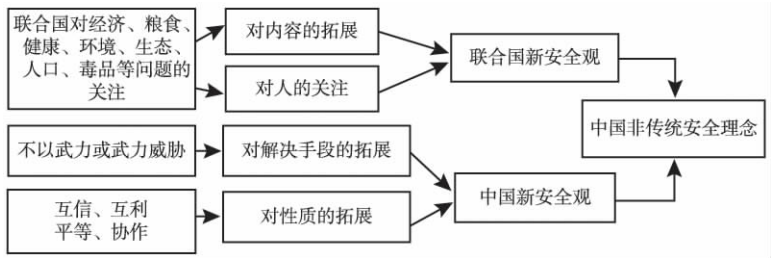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源流

（二）中国学者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定义方法

中国“非传统安全”的说法最早由王勇于 1994 年提出，<sup>③</sup> 此后很多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人民日报》2001 年 6 月 15 日。  
② 余建华 《上海合作组织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75 页。  
③ 余潇枫、李佳 《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 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1 期，第 90 页。“相互依存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是由其性质与特点决定的，主要表现在：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改变了每个国家安全的环境和制定安全政策（转下页注）”

学者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形成广泛的研究基础,学者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解也日渐深刻。但是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定义却是“琳琅满目”,至今为止学界还未形成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定义。通过梳理,本文大致将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定义归为以下四个类别。

#### 1. 排他性的定义方法

一些学者将传统安全之外的问题看作非传统安全问题,以排除传统安全的方法定义非传统安全。这些学者在采用“排他法”定义非传统安全时,在细节上仍有一些不同。

王逸舟认为,所谓非传统安全是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sup>①</sup> 张蕴岭认为非传统安全显然是指那些与传统安全有着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安全问题。众所周知,传统安全问题是与军事、武力直接相联系的,那么,望文生义,非传统安全则是那些与非军事、非武力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sup>②</sup>

在陆忠伟看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其“含义可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sup>③</sup>

余潇枫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体现行为体间“优态共存”的安全,

---

(接上页注③)的基础。那种只强调军事安全忽视其他领域的安全、只强调一国的国家安全忽视他国安全的旧有安全观念正在过时。”“国际安全要求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将有比以前更多的谈判。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各种国际组织、环境、毒品、难民等领域也都要求我国更多地参与和合作。”参见王勇《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6期,第63—66页。或许有学者更早一些时候在一些会议上提及过非传统安全,但无文本可依,因此本文接受引文所述观点。

① 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5月27日,第003版。

② 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③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页。

它与“非军事安全”或“全球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用。如果说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非军事”领域。<sup>①</sup>

## 2. 列举式的定义方法

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列举非传统安全的领域的方式对它加以界定。如张军社通过列举的方法，对属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进行了概括，它们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活动、贩毒走私、非法移民、严重传染病、自然灾害、洗钱、国内动乱与国家分裂、民族和宗教冲突、资源短缺、经济和金融危机、生态危机、信息网络攻击等方面。<sup>②</sup>也有一些学者，他们在采用排他法定义非传统安全的同时，又采用列举法，对该概念进行说明，例如，王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一书曾列出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石油资源、恐怖主义、水资源问题，并将它们划入“国际安全”这一概念范畴中。虽然当时尚未专门归纳出“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但该著作从头至尾都展开了针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余潇枫列举了如生态环境、移民难民、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全球性、跨国性的特征，其解决往往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来共同应对。<sup>③</sup>

## 3. 按要素分类定义方法

安全的要素包括行为体和问题领域等，李少军根据行为体和问题领域两个要素，将非传统安全威胁分为三类：第一，发生在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军事层面以外的其他安全问题，如经济制裁、武器非法出口等问题；第二，发生在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等问题；第三，发生在国家行为体与自然界之间的问题，诸如环境退

① 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② 张军社 《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载于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国际军事分会编《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

③ 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概论》，第41页。

化问题、传染病问题等。<sup>①</sup> 李滨将其分为两类，一是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的军事或非军事威胁，认为中国在国家安全层面上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分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丧失；二是指人的安全方面的议题，即与外部世界相联系所造成的对社会与人的威胁，如环境破坏、人口增长、资源短缺、公共健康、跨国犯罪、种族和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对立问题等。在人的安全领域面临的威胁排序是：一是经济性问题，必须长期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如国际经济与政治动荡导致的经济与社会混乱；二是社会性问题，一般情况下不属于最优先考虑，但特殊条件下属于紧急应对议题，如公共健康、跨国犯罪，环境与生态等。<sup>②</sup>

#### 4. 其他方式定义

也有一些学者并不直接定义非传统安全，而是给出非传统安全的一些特性。如朱锋着重探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认为非传统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并不必然排斥传统安全，也不能替代传统安全。<sup>③</sup> 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确立，是因为它提出并建立了不同于以往安全研究的问题领域，并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理论。传统安全的概念本身就是因为有了非传统安全才产生的”。<sup>④</sup>

### (三) 代表人物及著作

研究非传统安全的著作和文章汗牛充栋。本文以出版过以非传统安全为题的专著或在较长一段时间对此保持持续的关注并有较为连续的成果发表为标准，对代表人物进行选取。笔者认为研究非传统安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余潇枫、王逸舟、查道炯、陆忠伟、傅勇、徐华炳、李开盛等人。

---

①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2 页

② 李滨 《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排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3 期，第 44—46 页。

③ 朱锋 《“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第 146 页。

④ 朱锋 《“非传统安全”解析》，第 146 页。

其中,著作主要有余潇枫的《非传统安全概论》《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2011—2012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代表性的论文有《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 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sup>①</sup> 王逸舟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sup>②</sup> 查道炯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 非传统安全卷》,<sup>③</sup> 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傅勇的《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寿晓松、徐经年的《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徐华炳的《危机与治理: 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战略选择》,李开盛的《人、国家与安全治理: 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等著作和文章。

① 余潇枫与此相关著作和文章还有(包括合写合著:《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边界、语境与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1 期,第 55—61 页《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6 卷第 6 期,第 104—111 页《非传统安全: 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 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1 期,第 89—96 页《安全治理: 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 期,第 84—96 页。

② 王逸舟与此相关著作和文章(包括编著)还有《恐怖主义溯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中国与非传统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04 年 11 月 12 日,第 32—36 页《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人民日报》2003 年 5 月 21 日《非典与非传统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第 23—25 页《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3 期,第 2—10 页《论综合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4 期,第 5—14 页。

③ 查道炯与此相关中文文章还有《能源问题与中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7 年第 4 期《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 国际政治课题》,《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4 期《能源依赖进口不可怕》,《世界知识》2006 年 5 月第 9 期《中美能源合作: 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石油经济》2005 年第 11 期《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的能源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05 年 11—12 月号,第 28—32 页《东亚地区与中美关系: 能源问题》,《外交论坛》2005 年 12 月,第 34—35 页《相互依赖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世界政治与经济》2005 年第 6 期,第 15—21 页《三问中国未来石油安全——石油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石油企业》2005 年第 6 期,第 116—118 页《中国的能源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 8 期,第 59—67 页;英文文章有: Zha Daojiong “Promoting Energy Partnership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4, 2007, pp. 105—115 “Energy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utting Mutual Anxiety in Context,”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1, No. 3, June 2007, pp. 1—16 “China and the Worldwide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2, 2006, pp. 60—74 “Energy Interdependence,” *China Security*, Summer 2006, pp. 1—15 “Energy: an opportunity for U. S. - China Cooper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6 “China’s Energy Securit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Survival*, Vol. 48, No. 1, 2006, pp. 170—189。

#### (四) 主要流派和争论 (理论驱动型、问题驱动型、处方驱动型及其他类型)

##### 1. 理论驱动型

此种流派主要从价值和理论层面研究非传统安全,其代表人物是余潇枫。他在《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中,提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理念区别是“优态共存”和“危态对抗”。余潇枫主要从人的安全的角度,界定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边界,使对安全问题的研究由以往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使研究视野由一国扩大至全球,增强了理论的普适性。<sup>①</sup>这在其《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边界、语境与范式》等文中也有所体现。

##### 2. 问题驱动型

这类研究主要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关注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危机、边疆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核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以此进行该领域的深入分析,<sup>②</sup>这类研究的出发点未必都来自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而是就事论事,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如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危机等问题很早就存在,随着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也被一并纳入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王逸舟、李少军、查道炯。1999年,王逸舟在其专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中系统阐述了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生态、经济、资源、恐怖主义等。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发期间,王逸舟连续发表了《非典与非传统安全》《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等文章,2003年在其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2010年该书的修订版面世)

---

<sup>①</sup> 余潇枫、王江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边界、语境与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55—61页。

<sup>②</sup> 例如,潜旭明、倪世雄的《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米红、周伟的《人口城市化、碳排放与环境安全》,姜振飞的《中国核安全问题》,周洁红的《食品安全》,徐黎丽、孙春日的《中国陆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文章,载于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

一书中，则从恐怖主义入手，切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具体领域。2002 年李少军在其《国际政治学概论》中，阐述了经济安全、生态威胁、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此后还陆续发表了《论难民问题》《论经济安全》《由生态环境引起的国际冲突》等文章。从 2003 年起，查道炯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集中关注了能源安全问题，尤其重点关注石油安全，是典型的问题驱动型的代表人物。<sup>①</sup>

### 3. 处方驱动型

此类研究从国家行为体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角度切入，多数研究都是着眼于中国自身的立场，研究如何应对非传统威胁。赵远良、主父笑飞从外交新战略的角度，<sup>②</sup>徐华炳从危机治理和战略选择的角度，认为要善治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要未雨绸缪，早作预案，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机制，推进多边安全合作，建构中国的非传统安全战略。<sup>③</sup>李陆平、寿晓松、徐经年等从军队如何应对非传统威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陆平认为我军非传统安全的主要任务是反恐行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军事援助方面。维护非传统安全要建立健全军队应急机制，加强多力量建设、后勤和装备建设、训练和理论研究、舆论引导、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体制建设。<sup>④</sup>寿晓松、徐经年认为，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从组织指挥、力量建设、后勤保障、装备保障、教育训练、政治工作、法律保障、军地协同等方面入手，参与诸如反恐行动、维护社会秩序、抢险救灾、国际救援、维和行动、国际联合军事演习、能源安全、核化生安全等方面的研究。<sup>⑤</sup>熊光楷则从总体思路上，提出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要更新安全观念，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提倡标本兼治，

① 相关文章见本文前述注释。

② 参见赵远良、主父笑飞《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参见徐华炳《危机与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战略选择》，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

④ 参见李陆平主编《军队与非传统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

⑤ 参见寿晓松、徐经年《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兼顾两种威胁。<sup>①</sup> 这类研究为中国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出了诸多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

#### 4. 其他类型

其他类型主要对当前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如查道炯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非传统安全卷》,就是我国第一套非传统安全与现实安全丛书。赵远良、主父笑飞从外交战略角度编写了《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一书,这些文献梳理和分析工作对研究我国非传统安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文章,虽并未持续关注此问题,但也为我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起到了呼吁的作用。

### (五) 小结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理念源自联合国安全观和中国新安全观,后者在内容、性质、手段等多方面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的形成。中国学界对非传统安全有着各式各样的定义,通过梳理大体将其归纳为排他性定义、列举式定义、按要素分类定义及其他四个类别。中国学界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流派众多,可分为理论驱动型、问题驱动型、处方驱动型及其他等四个派别,各派从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深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各个方面。通过上述梳理,可较为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容貌”。

## 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共识与特点

### (一)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共识

鉴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尽管各自的表述不一,但是当前中国

---

<sup>①</sup> 熊光楷 《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世界知识》2005 年 8 月 8 日,第 50—53 页。

学界对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特点，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传统安全重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军事关系，而非传统安全更多地关注与非国家行为体相关的安全问题。

二是在对非传统安全研究问题的认识方面，存在广泛的一致性。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威胁下降，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深入推进，各种既存的、新生的威胁不断涌现，这些威胁的来源和表现特征不断多样化，世界各国已经无法以对待传统安全的方法来解决不断涌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三是在作用和意义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无论其采取何种视角，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政策意义、价值意义还是问题意义角度，都反映出非传统安全柔化传统安全矛盾及困境的意图和倾向。通过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试图超脱现实主义所预言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将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认为其有促进共同合作的功能。<sup>①</sup>

## （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特点

除了学界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其作用和意义方面达成一定程度共识外，笔者发现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非传统安全的界定是该领域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非传统安全概念和内涵还停留在比较含糊的状态，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诸多定义可操作性较差，已有的共识较多依赖各家的“默契”而达成，而非一种可操作化的认识方式。

前述对非传统安全定义的梳理和归类可以看出，无论是通过“排他性的定义方法”“列举式的定义方法”，还是“按要素分类定义方法”，当前国内对非传统安全的理解既有明确的一面，又有模糊的一面。明确的一面是，各家对哪些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差异较小。所以，尽管存在不同

---

<sup>①</sup> 朱峰 《非传统安全呼唤人类共同体意识》，《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23日，第54—55页。

的定义方式,但很少就哪些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产生争执。模糊的一面在于,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诸多定义操作性较差,将影响该学科的长远发展。

在这几种定义方法中,“排他性的定义方法”能够明确地以威胁来源进行概念及问题分界,这样有利于说明非传统安全不是什么,但不利于说明非传统安全是什么,这种定义方式弹性较大,略为笼统,容易导致非传统安全的无边界性,这正是目前非传统安全研究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列举式的定义方法”非常详细和具体,但随着问题的不断出现和增多,将面临不可操作和不可控的难题。“按要素分类定义方法”非常明确的以行为体为中心,从其互动对象的层次上进行分类,并对问题进行了一定的优先秩序排序,属于比较严谨的定义方法。从长远来看,未来关于非传统安全概念是否达成一致的争论,有可能主要集中于“按要素分类定义方法”上。

第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够,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本文通过 CNKI 数据库,选定了 10 种国际关系研究相关期刊,在“题名”项输入关键词“非传统安全”,共得到 39 个样本。<sup>①</sup>通过对样本文章的逐一分析和统计发现,能够提出问题的比例占 33.3% (见表 1),能提出好的问题的文章则更少。在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有限样本的情况下,先驱学者们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并做出了实际的尝试难能可贵,但是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提高,学科就难以取得更大的发展。

---

① 为进一步详细考察学界的研究情况,本文将考查范围限定在专业学术期刊,根据《CSSCI (2012—2013) 来源期刊目录》,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期刊有 17 种。通过 CNKI 数据库,在限定出版年份的前提下,根据上述不同的期刊,在“题名”项输入关键字“非传统安全”,共得到 42 个结果。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情况,故不将外国作者的作品计算在内。在 17 种专业期刊中,有的期刊输入关键字后无结果,故最后入选的杂志为 10 种,最后得到 39 个样本,入选杂志和样本分布分别是《当代亚太》4 篇、《俄罗斯研究》2 篇、《东北亚论坛》3 篇、《世界经济与政治》15 篇、《国际关系学院学报》4 篇、《拉丁美洲研究》1 篇、《南洋问题研究》1 篇、《现代国际关系》5 篇、《国际观察》2 篇、《国际问题研究》2 篇。通过此取样方式,基本兼顾高校学报、综合性研究机构和专门问题研究机构三方面的研究实际情况,同时也基本代表了中国现阶段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水平。此前也有学者对中国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如余潇枫在 CNKI 数据库中,对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年份及其所属杂志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该分析从全局的角度,对报纸、杂志等各类出版物做了较为宏观的分析。见余潇枫《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 (2011—2012)》,第 37—38 页。

表 1 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分布

| 内容      | 提出问题  | 理论假设  | 概念操作化 | 假设检验  |
|---------|-------|-------|-------|-------|
| 数量      | 13    | 5     | 4     | 5     |
| 比例( % ) | 33. 3 | 12. 8 | 10. 3 | 12. 8 |

阎学通认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其研究问题可分为三类：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sup>①</sup> 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把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和推理性两个类别。<sup>②</sup>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推理性研究和处方性研究三类。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这一比例高达 64.1%（见图 2）。就像生物学的发展建立在相关博物学发展的基础上一样，随着样本资料的增加，其学科不断走向成熟，非传统安全研究亦是如此，其研究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还需要更多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样本文献的作者们都是先驱者，但是也反映了非传统安全研究还处于摸索成长期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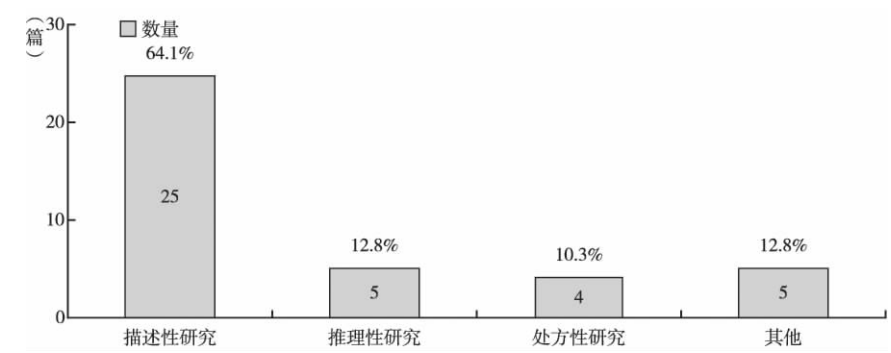


图 2 当前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分布情况（1999—2012）

说明：其他是指专家访谈、综述、随笔或会议纪要等不应纳入研究范畴的文章。本图系笔者绘制。

① 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 页。  
② 秦亚青 《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5 页。

第三,以科学研究程序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还有较大空间,非传统安全研究距学科成熟仍有一定距离。笔者就上述样本文章的科学研究方法使用情况进行单项考察发现,能够提出问题的占 33.3%,有理论假设的占 12.8%,有概念操作化的占 10.3%,有假设检验的占 12.8% (见表 1),均处于较低的比例。如果完整的就针对具体议题,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给出理论假设、对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最后通过实证来检验假设这五个环节对样本进行考察,几乎没有一例符合科学研究程序标准。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而科学研究程序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它将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结合在一起,<sup>①</sup>普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改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sup>②</sup>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在基础样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若再能适当引入以科学研究程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相信中国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会建立概括性较强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会有大量的研究按照这个范式进行。非传统安全作为国际关系学这一独立社会科学的子课题,其研究应当同样符合上述基本要求。但目前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并未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研究范式。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政策体系都不完备,<sup>③</sup>非传统安全研究距学科成熟仍有一定距离。任何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是一门学科或某一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需要无数的先驱进行探索,需要海量的基础数据和资料。无论如何,当前中国学界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绝对是一件好事,它代表未来在该领域产出重大成果的可能性。

### (三) 小结

面对上述三大问题,笔者认为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要取得更大进步,

---

① 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 27、98 页。

② 阎学通 《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③ 余潇枫主编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 2011—2012》,第 1 页。

首先要克服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形成一个学界普遍接受的标准，以此为基础，加强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必须要说的是，本文所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以科学研究程序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不同的问题，应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也好，定量研究也罢，由于并非每个研究者都能总是拥有对历史和时空深邃洞察的思想，若能适当参照科学研究程序，则使得发现规律的客观性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于促进知识积累的效果将是显而易见的。

### 三、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比较

与中国学者相比，其他国家学界较少提及“非传统安全”一词。通过 JSTOR 等主要人文社会学科西文数据库检索以“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为题目的英文论文，只有 12 篇。在英国学界，使用“非传统安全”词语的研究论文很少，甚至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先驱巴里·布赞也不常使用该词语。另一方面，通过人的安全和全球治理研究非传统安全属下的各种问题，其他国家学者和政府对相关议题的讨论并不少。在国外有众多研究机构专门研究非传统安全，<sup>①</sup> 各机构侧重于不同的议题。例如，美国福特研究所集中研究战争中的儿童问题、难民问题以及强制劳动等人道主义相关话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的安全研究所深入探讨粮食安全问题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重点关注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健康问题以及边界冲突等。<sup>②</sup> 下文将通过对中外非传统

① 例如，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属下的福特研究所（Ford Institute for Human Security）、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Liu Institute for Global Issues）属下的人的安全研究所（Human Security）、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所（The RSIS 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等。

② 关于具体的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可参照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fordinstitute.pitt.edu>（Ford Institute for Human Securit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SA）；<http://www.rsis.edu.sg/nts/>（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Graduate School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http://www.ligi.ubc.ca/home.htm>（Liu Institute for Global Issu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安全研究的对比,认识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并尝试总结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些一般规律。

### (一) 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之同

第一,各国都是在面临重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时,才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警觉和重视,在某个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后才进行有关研究,非传统安全研究偏向刺激-反应型研究。

中国学术界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探讨非传统安全,2001 年“9·11”事件后,学术界开始概念梳理和理论介绍等,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上升到外交实践领域,2003 年 SARS 的到来,2005 年禽流感爆发,使中国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剧增,政府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位上升到国防任务高度。

“9·11”事件后,2002 年 9 月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sup>①</sup>其他地区问题、大国关系等基本都围绕着反恐的需要部署。<sup>②</sup>学术界也围绕恐怖主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等。在 Springer 等社会科学英文数据库检索有关文献,发现 2001 年“9·11”事件发生以后发表的与非传统安全以及恐怖主义有关的论文、书籍、报纸等文献的数量剧增。如 1982 年以后发表的“美国的人的安全”有关文献总数为 2688 篇,其中 2255 篇(占 83.9%)是 2001 年以后发表的;有关“美国的非传统安全”文章有 1374 篇,其中 1187 篇(占 86.4%)是“9·11”事件后发表的,有 299 篇是恐怖主义有关文献。欧洲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则是从科索沃危机开始,这一事件当时被欧洲国家普遍看作发生在身边并且影响欧洲稳定的大事。<sup>③</sup>西欧国家开始

---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②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 71 页。

③ B. Vankovska and T. Mileski, “Securing Humans And/Or Environment In The Post - Conflict Balkans,”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M. Kaldor, M. Martin and S. Selchow, “Human security: a new strategic narrative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Issue 2, 2007.

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时期是“9·11”事件之后，但在2005年“7·7伦敦爆炸”事件之前，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是学界关注的一个抽象概念，“7·7伦敦爆炸”事件后，英国等欧洲民众才真正感到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威胁。<sup>①</sup>日本在受到2011年“3·11”大地震的巨大冲击后，开始将关注点转向核安全、能源、危机管理等方面。<sup>②</sup>

第二，中外学术界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成果，大多都是理论推理性研究成果较少，描述性研究或政策建议成果较多，提升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性困难较大，这一学科整体来说偏重政策导向和具体应用。

以中国为例，中国学术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发表了较多数量的论文，非常关注和重视该问题，但通过对中国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章（偏学术）进行分析发现，推理性文章仅占12.8%，描述性文章占64.1%（见表2），这可能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对象和问题领域太宽泛有关联，研究领域太广，实则对深入研究不利。

1983年，美国学者理查德·乌尔曼在“Redefining Security”一文首次强调非军事威胁的重要性。此后，尤其是经过“9·11”事件，非传统安全研究（尤其是恐怖主义研究）成为美国安全研究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也多，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美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大多从政策建议以及政策研究的使用情况入手，每篇文章以某个特别的话题为中心，大部分是一次性的研究，<sup>③</sup>专门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

① Hinkson John, “After the London Bombings: Global Terror, the West and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Arena Journal*, No. 24, 2005, pp. 139–159.

② “特集—非伝統の安全保障問題”、『海外事情』、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2011年7・8月号。

③ Roland Paris,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2001. 目前，美国学界以及社会关注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有反恐、移民安全、网络安全、环境安全、健康安全、法庭安全等。参见 Fiona B. Adamson, “Crossing Bord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Nicholas J. G. Winter, “Beyond Welfare: Framing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White Opinion on Social Secur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2, 2006; Lene Hansen and Helen Nissenbaum, “Digital Disaster, Cyber Security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3, No. 4, 2009; Colin McInnes, “HIV / AIDS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2, 2006; John (转下页注)

的学者为数不多,理论和推理性研究成果较少。日本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的研究是从某一问题入手切入非传统安全方面,甚至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状况。<sup>①</sup>

## (二) 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之异

第一,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上,中国倾向于使用非军事手段应对,美国倾向于以传统安全的视角和军事手段应对。

中国不仅倾向于使用非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中国也努力通过非军事手段来解决。<sup>②</sup>例如,为解决朝核危机设立的六方会谈就是该努力的一种。中国也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及安全,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加强对话和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区分较为明显,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等都划入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之中。

美国倾向于以传统安全视角和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乌尔曼曾批评美国政府用狭义的国家安全概念,过度看重安全的军事意义方面,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界定国家安全是一种虚象,会误导现实以及忽略其他威胁,会降低国家和全球的总体安全。<sup>③</sup>美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受到学界和政

---

(接上页注③) M. Greacen and Robert J. Klein, "Statewide Planning for Court Secur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76, 2001. 这些文章显示着对于某种议题的关注,除研究反恐之外,研究其他议题的研究人员大部分写一两篇的有关文章,并没有长期研究一个固定议题的学者。

① 天児慧、『アジアの非伝統的安全保障Ⅱ: 中国編』、勁草書房、2011 年; 後井隆伸、「中国における非伝統的安全保障論の展開と人間の安全保障」、『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第 15 巻第一号、2010 年。

② 其他亚洲国家也长时间摸索通过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法。例如,东南亚国家 1976 年已宣布《东盟和谐宣言》,共同应对控制人口增长、毒品销售等问题。虽然其历史比西方还短,但亚洲国家非常积极参与应当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与全球问题有关的讨论。日本处在特殊情况,虽然它实际上是亚洲地区的军事大国之一,但在名义上受到《和平宪法》的束缚,实行专守防卫且不能将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韩国、新加坡等也倾向于采用非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③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1983, p. 129.

府重视，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不太明显，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美国纳入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的框架中。例如，恐怖主义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战争”（或者说恐怖主义是“战争”在当代的另一种新形式）。

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余潇枫、林国治认为中国“和合中庸、礼让为国”的传统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文化自觉的外交伦理原则，主要通过道德教化去“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西方“征服世界”的传统不同），多从“和合论”的视角理解安全（与西方强调“威慑”与“征服”的安全思维不同），多主张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sup>①</sup>中国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不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现代新安全观也对中国安全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而美国对于安全的高标准和高层次，<sup>②</sup>以及应对外部威胁时追求绝对安全，使其倾向于采用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其在面对诸如恐怖主义袭击时所做的回应那样，让那些安全标准较低的国家难以理解。<sup>③</sup>同时，在军事上的强大自信（世界军事霸主地位）也使其相信无论何种安全问题，都能通过军事手段有效解决。

第二，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议题和内容）来看，中外研究的路径和进程有所不同。

巴里·布赞将国际安全研究以不同研究视角的出现进行了时间排序：前后依次是战略研究（1945年后）、和平研究（20世纪50年代）、早期扩展派（20世纪60~70年代，80年代到达高峰）、女性主义安全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① 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伦理向度》，《浙江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6卷第6期，第108—109页。

② “可以从美国热衷于人造卫星以及从为了确保美国处于有利地位而热衷于制定威慑的逻辑细节中看出来，更明显的是美国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和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的投入颇多，旨在确保其不受攻击，还体现在冷战结束以来仍然决定保持前所未有的高军费支出（尽管之中也存在着国内官僚政治等因素）。”参见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26页。

③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架构》，第125—126页。

90 年代流行)、哥本哈根学派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批判安全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的安全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后殖民安全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常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批判建构主义安全研究 (20 世纪 90 年后)<sup>①</sup> 并进行了简述,此后琳娜·汉森在此基础上,从非传统安全的指涉对象入手,对上述涉及非传统安全的主要路径作了进一步阐释 (主要是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人的安全研究、后殖民安全研究)<sup>②</sup>

借鉴巴里·布赞梳理的国际安全发展脉络,以及其构建的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架构,参照琳娜·汉森的阐释,笔者将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归为早期扩展派 (conventional wideners); 美国处在战略研究和早期扩展派之间; 欧洲则居于哥本哈根学派 (the Copenhagen School) 和人的安全研究之间。<sup>③</sup>

中国非传统安全关注的领域比较宽泛,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诸多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活动、贩毒走私、非法移民、严重传染病、自然灾害、洗钱、国内动乱与国家分裂、民族和宗教冲突、资源短缺、经济和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气候、资源、食品、健康、信息网络攻击,等等,没有一个议题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追求综合安全,可归为“早期扩展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类似。日本基于自身地缘政治条件和利

① 巴里·布赞 《论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架构》,第 117—119 页。

② [丹麦] 琳娜·汉森 (Lene Hansen):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 话语分析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3 期,第 91—100 页。她认为非传统主义 (non-traditionalist) 最激进的两个视角是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建构主义分处非传统安全研究谱系的两端,处于中间地带的研究路径则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和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所有这些研究路径都明确关注安全指涉对象这一问题,其中哥本哈根学派介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倡导“个人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传统和平研究和批判安全研究之间。其他三种路径往往在维护个体安全概念和特定的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安全观上相互交叉。

③ 战略研究、早期扩展派、哥本哈根学派和人的安全研究学派的主要特征和含义是: 战略研究聚焦于政治、军事领域,以国家中心主义为标准立场; 早期扩展派主要努力是超越军事领域,来扩展安全议程,进入到经济与环境部门,但仍以国家为安全载体; 哥本哈根学派一方面要求扩大威胁的来源和涉指对象,另一方面呼吁地区层次的安全分析,着重追求社会安全; 人的安全研究强调人类安全是安全的主要客体,因此国际安全应该包括饥饿、不发达、贫困等议题,寻求将国际安全议程与发展议程合并。参见巴里·布赞 《论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架构》,第 117—119 页; 琳娜·汉森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 话语分析的启示》,第 96—98 页。

益关系，主要关注跨境犯罪（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洗钱、走私、人口贩卖等）、国际援助等问题。<sup>①</sup> 韩国集中于金融、环境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新加坡关注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健康问题以及边界冲突等。

在美国，恐怖主义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列为头号威胁，<sup>②</sup> 恐怖主义被其宣布为“战争”。此外，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移民问题也是美国政府和民众主要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按照 2001 年到 2008 年的民意调查，“美国人认为的国家危机”中移民问题排位第十。<sup>③</sup> 近来美国还十分关注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所谓的《网络情报共享和保护法案》（Cyber Intelligenc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Act, CISA），旨在保护美国电脑网络免遭攻击。<sup>④</sup> 由此看来，美国处在战略研究派和早期扩展派之间，聚焦于政治、军事领域，也关注移民、网络安全等问题。

欧洲重点关注恐怖主义、环境、移民、宗族等问题。例如，英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界定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失败国家、种族和宗教冲突、伊斯兰极端势力等来自国外的全球性威胁。<sup>⑤</sup> 此外，还强调民主发展、人权、基本自由、法制、良好

① 『アジアにおける非伝統的安全保障と地域協力』、東京財団、2008 年 12 月、河村雅美、「東南アジアの海を海賊、テロから守れ－非伝統的安全保障に関する提案」、JBPress, 2011 年 12 月 6 日。

②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③ “Global Public Opinion in the Bush Years (2001—2008),” Pew Research Centre, December 18, 2008, <http://www.pewglobal.org/2008/12/18/global-public-opinion-in-the-bush-years-2001-2008/>.

④ “Cispa cybersecurity bill passed b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Guardian* (UK), April 27, 2012. 关于《网络情报共享和保护法案》，参见 [http://www.rules.house.gov/Media/file/PDF\\_112\\_2/LegislativeText/CPRT-112-HPRT-RU00-HR3523.pdf](http://www.rules.house.gov/Media/file/PDF_112_2/LegislativeText/CPRT-112-HPRT-RU00-HR3523.pdf).

⑤ 2010 年 10 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与尼克·克莱格 (Nick Clegg) 共同发布的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一书中，显示英国的四大潜在头等威胁：最严重的问题是恐怖主义、网络威胁 (Cyber Attack)，第二是自然灾害以及因其他国家的内战以及恐怖主义而形成的威胁，第三是能源安全以及核/放射能污染的扩散，第四是非法移民和犯罪组织等。参见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reat Britain Cabinet Office, [http://www.direct.gov.uk/prod\\_consum\\_dg/groups/dg\\_digitalassets/@dg/@en/documents/digitalasset/dg\\_191639.pdf](http://www.direct.gov.uk/prod_consum_dg/groups/dg_digitalassets/@dg/@en/documents/digitalasset/dg_191639.pdf).

的政府等,推动沟通技术和公共外交的发展而维护人的安全。欧洲混处在哥本哈根学派和人的安全研究学派之中,特别关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sup>①</sup>

第三,在“非传统安全”话语权的主导者方面有所不同。中国是国家主导,学界跟进;美国主要是国家主导;欧洲是学界达成共识,非政府组织“推波助澜”,政府制定政策实施。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最主要差距之一是:谁来应对威胁,谁支付安全问题的成本。传统上,主导安全问题的行为者是主权国家。由于经济危机、不善治理(Bad Governance)以及赶不上全球化趋势等原因,部分国家对于保障安全能否拥有足够的能力存在疑问。目前的安全讨论反映了国际现状的变化以及观念的转变。安全话语不再限于国家权力和国家主权。<sup>②</sup>因此,在应对非传统威胁时,除了主权国家政府之外的行为体,如学界、国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也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非传统安全研究始于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安全观念之脱离,但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保持国家主导安全话语,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由国家主导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情况大约有两种:第一,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机,潜在威胁的外部敌人还存在;第二,还没彻底解决领土完整以及国家主权等内部事务,如中国正面临着边境问题、海洋争端、两岸问题等与领土主权有关的挑战,国家成为安全问题(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中轴,学界鉴于国家的现实需要跟进研究。另外,亚洲主导非传统安全的也基本是国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认为,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安全模式以及一国政府的影响力。

美国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安全话语的国家。在美国,具体主导安全话语

---

① “社会安全这一概念最初应对的是后冷战时期国家(如东欧国家的民族冲突)、西欧国家内部的移民问题以及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恐惧等情形。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之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society)也成了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参见琳娜·汉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话语分析的启示》,第96页。

② Lloyd Axworthy,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utting People First,” *Global Governance*, Vol. 7, 2001.

的是政府，国家安全决策的中枢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是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传统安全问题的负责人。身为霸权国家，美国比较容易对付危害领土、政府、公民安全等其核心国家利益的任何威胁。因此，美国有时反对比自己弱小的势力主导人的安全倡议，假若该倡议向美国公民的权利挑战。<sup>①</sup>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一直消极对待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当今世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最积极的、具有领先地位的势力之一是欧洲，欧洲主要通过学界谋求共识，非政府组织通过与学界的联系及现场活动，形成舆论，“推波助澜”，国家制定政策加以实施。欧洲国家具有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领土完整以及国家主权问题基本上完全解决，他国侵犯本国领土的可能性极小。不过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规模较小，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一国的物质与作战能力有限，很难单独解决问题。因此，这些中小国家必须通过与外部势力的合作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通常通过学界的研究来接近非传统安全问题，通过学界的研究和讨论达成共识后，将其转达给国际机构或者国家间合作组织，形成一种安全联盟以后，各国政府形成有关政策和方针。如瑞士、挪威、希腊、爱尔兰、荷兰等国从1998年积极推动建立了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人类安全网络”。

### （三）小结

在对比中外非传统安全研究后发现，中外非传统安全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就共性来说，该学科整体偏向于刺激－反应型研究，同时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和应用色彩。在差异性方面，中国属于典型的“亚洲路径”，由国家主导非传统安全的话语，以非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追求综合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进程中可归于早期扩展派；美国主要

---

<sup>①</sup> Ronald M. Behringer,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on the Human Security Agend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0, No. 3, September 2005.

走“美国路径”，话语权由国家主导，以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关注政治、军事领域，也关注移民、网络安全等问题，在国际安全研究进程中处在战略研究派和早期扩展派之间；欧洲则走经典的“欧洲路径”，非传统安全议题通常先由学界谋求共识，非政府组织推进，形成舆论，再由政府制定政策实施，特别追求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进程中居于哥本哈根学派和人的安全研究学派之间。

#### 四、结论

相对于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弱势地位，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更加突出，相关研究和著述也颇丰。笔者通过对 10 种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期刊中含有“非传统安全”一词的文章为样本进行统计，发现了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特点和问题：一是中国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共识大多依赖于学者间的默契，对非传统安全的诸多定义可操作性较差；二是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够，学术成果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三是科学研究方法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还有较大空间，目前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并未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研究范式，距学科成熟仍有一定的距离。

中外非传统安全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就共性来说，该学科整体偏向于刺激—反应型研究，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和应用色彩。在差异性方面，中国在国际安全研究进程中归于早期扩展派，属于典型的“亚洲路径”，美国主要处于战略研究派和早期扩展派之间，走的是“美国路径”，欧洲则在哥本哈根学派和人的安全研究学派之间，走经典的“欧洲路径”。

概言之，虽然非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学界前辈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但当前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仍处于较低水平，面临的主要瓶颈一是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和可操作性，二是研究方法。今后在这两个方面下工夫对提升研究水平将大有裨益。

## 作者简介

曹金绪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jinxucao@163.com

吴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fairstein@gmail.com

曹玮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2012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外交。

电子信箱: cwangel@163.com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1997年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2002年和2005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分别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专著有《治理美国:国会的角色与模式》《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外交学原理》等。

电子信箱: kejinzhao@tsinghua.edu.cn

张伟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1级博士生。

电子信箱: zhangwy08@139.com

陈哲 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

电子信箱: chenzhecom@gmail.com

表娜俐(韩)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1级博士生。

电子信箱: djmousai@hotmail.com

沃德·沃姆丹姆(Ward Warmerdam)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电子信箱: warmerdam@iss.nl